

外交出访会影响一国的出口贸易吗

赵永亮 唐丹丹 魏瑶瑶

摘要：本文借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选取2010—2017年中国和100个贸易伙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出口具有溢出效应；国家首脑出访、双边互访、单边主动出访、双边访问依次比政府外长出访、单边访问、单边来访、多边访问对外贸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的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国家之间外交和贸易的关系提供了证据，为各国通过外交沟通营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国家首脑出访；外交；出口；贸易伙伴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19) 09-0054-15

引言

Moons 和 Bergeijk (2013)^[1]指出外交在促进国际商业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能够扫除或减少国际交易中由政治不确定造成的障碍。本文试图研究外交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为外交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提供理论支撑。具体而言，本文检验了中国100个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与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把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一是因为本文意在引起那些漠视外交在贸易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家的关注；二是本文仅把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视为一个典型，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分析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更具有代表性，也能够镜像说明如果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受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活动的影响，那么贸易伙伴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也会受双方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活动的影响，从而启示世界各国重视外交在外贸中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关于外交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包括国际贸易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外交关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内学者主要定性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蔡洁(2011)^[2]研究发现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珠三角集群及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企业邻居效应研究”(19JNKY03)；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培育项目“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研究”(12JHQ026)。

[作者信息] 赵永亮：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丹丹（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510632 电子信箱 tangdandansm@163.com；魏瑶瑶：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会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金灿荣和戴维来(2014)^[3]指出尽管中美两国在产业发展战略等诸多领域具有竞争性,但是多层次、多领域、多级别互动的对话机制能够化解双方危机,发挥政治互动在稳定贸易方面的作用。迟永(2015)^[4]提出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增加两国外交政策的相似度。

国外学者则主要定量分析外交活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Pollins(1989)^[5]构建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用贸易伙伴双方发生冲突和合作的数据构建外交变量的指标,发现进口贸易额显著地受到双方外交活动的影响。Morriset(2003)^[6]发现投资出口促进机构对投资和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投资促进机构的预算支出每增加10%会引起FDI增长7.5%,平均每一个海外出口促进机构增加1美元投入,可以促使贸易增加40美元。Volpe和Carball(2011)^[7]用企业层面高度细分的数据研究发现,哥斯达黎加的海外出口促进机构有助于差异化产品的内延边际和外延边际的增长,但却无助于同质产品和参考价格产品的二元边际增长。Nitsch(2007)^[8]使用1948—2003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数据发现,贸易代表团促进了贸易合作,对不同国家外贸的影响从6%至10%不等。Rose(2007)^[9]、Moons和Bergeijk(2013)、Van和Yakop(2011)^[10]都基本肯定了大使馆、领事馆、贸易代表团、国家首脑出访或海外出口促进办事机构等外交活动对贸易的积极影响,并且大使馆对外贸的影响更大,而名誉领事馆对贸易根本没有影响。但是Gil等(2008)^[11]的研究却发现,西班牙的海外出口贸易机构对贸易的促进效应大于大使馆和领事馆,并指出海外区域贸易投资机构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具体和针对性的服务,而外交使团由于从事更广泛的双边事务(政治、军事、文化等),往往对企业缺乏针对性的服务。Aidt和Gassebner(2010)^[12]验证了贸易代表团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不同体制的国家中不尽相同。但是也有研究否认了贸易代表团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如Michael Hart(2007)^[13]发现贸易代表团对贸易和投资模式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许多已经宣布和签署的交易并没有实现。Head和Ries(2010)^[14]发现加拿大的贸易代表团对贸易的影响微不足道,虽然加拿大政府与中国签订的销售订单增加了当时的出口总量,但并没有对其他企业的出口产生长期影响。这似乎是大多数文献中具有独特结论的研究成果,因为大多数研究认为经济外交通常与贸易流量增长有关,外交引致长期的贸易、稳固的关系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至少与其中一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流有关。

以上研究大都认为外交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但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三个方面:第一,两者之间联系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仍然薄弱。第二,受制于研究方法、样本或指标选取,研究结论尚未定论。国内主要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鲜有定量方面的实证研究,从而缺乏说服力。国外研究大量使用了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但是样本主要局限在发达国家层面,由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文化、制度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往往引致国家的贸易壁垒不同,因此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外贸对外交的依赖性可能不同,在个别样本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通用性。国外研究主要以大使馆、领事馆或者海外办事机构作为外交的代理变量。第三,以往研究只限于双边外交和国际贸易的研究,多边区域性外交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极少涉及。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国家首

脑、政府外长出访这一具体行为来衡量外交对贸易的影响，克服了仅仅以大使馆、领事馆等作为外交代理变量的限制；第二，本文选取中国 and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数据，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克服了以往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单一而难以保证结论普遍性和稳健性的缺点；第三，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做铺垫。

二、理论机制及理论模型

（一）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

以 Deardorff (1998)^[15] 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冰川贸易成本的存在影响着国家间的贸易流量，Grinblatt 和 Keloharju (2001)^[16] 指出不但地理障碍影响着两国的交易成本，边境、语言、法律体系等文化因素也能影响两国贸易的交易成本和贸易流，Plouffe 和 Sterren (2016)^[17] 进一步指出外交官能解决或降低外贸不确定性风险和交易成本，从而稳定市场预期以及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Gray 和 Potter (2017)^[18] 指出外交互动有助于解决贸易争端。本文认为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主要通过两条机制影响交易成本和贸易流：第一，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他国能够减少或消除两国的误解、争议或摩擦，为两国间贸易提供稳定的政治背景，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成本和沉没成本；第二，信任机制，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能够起到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增强两国人民互信的作用，形成有力的投资预期和创造贸易需求。

1.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是一国重要的外交活动，谈判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人权、环境保护和文化等领域，并可能涉及到具体的经济合作、投资项目等，某些在制度、深层次、多领域层面影响具体商业关系的障碍，只有通过国家首脑、政府外长之间的具体协商方能解除。国家首脑、政府外长是国家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的影响。正如 Kostecky 和 Naray (2007)^[19]、Naray (2010)^[20] 指出，国家首脑出访在协助私营部门克服交易成本以及正式和非正式贸易障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两国自由贸易铺平道路，维护和促进本国出口市场的发展。国家首脑出访活动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化 (Rose, 2007)。国家首脑对外出访时还常常伴随着一个由商界人士组成的高级代表团，代表团在出访之前已经就商业合作的范围、合约条款做了深入的准备，经过国家首脑之间的沟通、协调，往往最终正式签订商业合同。

2. 信任机制

国家首脑、政府外长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相比函电会晤、派驻领事馆或大使馆具有便于沟通的优点，有利于双方达成建设性的成果。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是一项国家重要的公关活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国访问需要双方在人力、物力方面提供大量支持，并提前对他方国家诉求进行预期、预备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难以协调问题的解决预案和谈判筹码、提前熟悉对方国

家繁杂的外交礼仪等,所以国家首脑、政府外长不远万里出访他国,充分彰显了双方建立互信的诚意以及两国相对友好国际关系的预示,从而增强市场主体对两国政治关系稳定的信心,有助于企业形成有利的对外投资预期,双方互信关系的建立能减少企业寻找交易对象的信息搜索成本,鼓励两国贸易。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能进一步促进两国民间的交流,深化人民感情,增强两国文化乃至产品对双方消费者的吸引力,从而创造贸易需求。

(二) 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影响贸易的理论模型

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能够影响包括贸易摩擦成本、沉没成本、信息搜索成本在内的贸易交易总成本,本文以 Deardorff (1998) 的微观模型为基础,将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两国地理距离、边境、语言作为总交易成本的影响因子,建立一个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来分析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模型假定:生产国为 i , 进口国为 j , 生产国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价格为 p_i , 两国的交易总成本为 t_{ij} ($t_{ij} > 1$), 进口国 j 的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是 CES 形式, 则国家 j 的 CES 效用函数表达为:

$$U_j = \left(\sum_i \beta_i c_{ij}^{(\sigma-1)/\sigma} \right)^{\sigma/(\sigma-1)} \quad (1)$$

$\sigma > 0$ 表示不同国家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常替代弹性, c_{ij} 为国家 j 从国家 i 进口的商品数量, β_i 是常数。

尽管出口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为 p_i , 但进口者除了支付产品的价格之外, 还要支付进口活动涉及的包括运输、文化差异、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间接交易成本 t_{ij} , 因此在进口国 j 市场, 消费者支付的实际价格为 $t_{ij}p_i$ 。 j 国所有进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可表达为:

$$p_j = \left(\sum_i \beta_i t_{ij}^{1-\sigma} p_i^{1-\sigma} \right) \quad (2)$$

j 国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Y_j = p_j c_{ij} \quad (3)$$

Y_j 表示 j 国的国民收入。

j 国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消费, 可得到进口数量:

$$c_{ij} = \frac{1}{t_{ij} p_i} Y_j \beta_i \left(\frac{t_{ij} p_i}{p_j} \right)^{1-\sigma} \quad (4)$$

则出口国的出口价值为:

$$x_{ij} = p_i c_{ij} = \frac{1}{t_{ij}} Y_j \beta_i \left(\frac{t_{ij} p_i}{p_j} \right)^{1-\sigma} \quad (5)$$

假定国家 i 的消费者的消费按照 Cobb-Douglas 形式进行, 使用收入中固定份额 β_i 的部分用于消费, 这一消费行为可表达为:

$$Y_i = p_i x_i = \beta_i Y_w \quad (6)$$

Y_i 表示 i 国国民收入, Y_w 表示世界的国民收入, 从方程 (5) 可以发现 $\beta_i = Y_i / Y_w$, 将 β_i 带入方程 (5), 可得国家 i 向国家 j 的出口额为:

$$x_{ij} = Y_j \frac{Y_i}{Y_w} t_{ij}^{-\sigma} \left(\frac{p_i}{p_j} \right)^{1-\sigma} \quad (7)$$

从方程(7)可以看出一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是交易成本的单调函数,控制其他条件不变,交易成本 t_{ij} 越大出口价值越小,交易成本越小出口价值越大。交易成本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国的语言越相似,双方沟通的成本越低;两国如果接壤或者距离越近,则贸易的运输成本越低;两国国家首脑、政府外长互访的次数越多,越能够减少信息搜索成本和不必要的外贸摩擦方面的交易成本。参照Melitz(2003)^[21]的类似做法,把两国贸易的交易成本写为以下函数形式:

$$t_{ij} = (VDBL)^{-\gamma} \quad (8)$$

其中, V 表示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因子, D 代表两国的地理距离, B 代表两国的边境是否接壤, L 表示两国语言的相似性, γ 表示常数。将式(8)带入式(7)可得:

$$\begin{aligned} \ln x_{ij} = & \ln Y_i + \ln Y_j + \ln Y_w + \sigma \gamma \ln Y_i + \sigma \gamma \ln V_{ij} + \sigma \gamma \ln D_{ij} + \sigma \gamma \ln B_{ij} \\ & + \sigma \gamma \ln L_{ij} + (1 - \sigma) \ln p_i + (1 - \sigma) \ln p_j \end{aligned} \quad (9)$$

从方程(9)扩展的引力模型可以看出,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影响着出口贸易流。

三、计量模型设计、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本文根据理论模型(9)构建检验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和贸易之间具体关系的扩展引力模型:

$$\begin{aligned} \ln exp_{ijt} = & \alpha + \beta_1 dip_{ijt} + \beta_2 \ln dist_{ijt} + \beta_3 \ln lang_{ijt} + \beta_4 border_{ijt} + \beta_5 \ln cgdpt_{it} \\ & + \beta_6 \ln wgdpt_{jt} + \beta_7 \ln p_{jt} + \beta_8 open_{it} + \varepsilon_{ijt} \end{aligned} \quad (10)$$

其中, i, j, t 分别代表中国、贸易伙伴、年份, ε_{ijt} 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和度量如下。

第一,被解释变量: exp_{ijt} 是贸易伙伴 j 在 t 年份对中国的出口额。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 dip_{ijt} 代表 t 年份中国 i 与 j 国之间国家首脑、政府外长访问的虚拟变量。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他国是一个国家外交意志、外交权利的集中体现和最高代表,故本文将国家首脑、政府外长作为外交的代理变量。文中的国家首脑主要包括国家主席、总理、总统和首相,政府外长特指外交部长,由于国家政体不同而对国家首脑和外交部长称谓不同,本文对于国家首脑和外交部长的选择标准是实际权力而非称号。如果在第 t 年,中国 i 和国家 j 之间国家首脑、政府外长有出访记录,则 dip_{ijt}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第三,主要解释变量: $cgdpt_{it}$ 、 $wgdpt_{jt}$ 分别代表 t 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贸易伙伴 j 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dist_{ijt}$ 代表中国与贸易伙伴 j 的地理距离,CEPII数据库提供了首都之间的距离、人口加权的距离等几种国家之间距离的测量数据。其中,人口加权的距离,是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存在边境效应,地理层面上的首都距离会高估距离对贸易造成

的障碍，于是引入了两国的首都城市人口分别在其国家人口中所占的权重进行调整，与前者相比，人口加权的首都距离更适合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距离对贸易造成的障碍，本文选取人口加权的距离来衡量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

$lange_{ij}$ 、 $border_{ij}$ 分别代表贸易伙伴 j 与中国是否具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的虚拟变量，如果是，则给这些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第四，其他控制变量： tfp_{it} 为贸易伙伴 j 在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open_{it}$ 代表中国在 t 年的市场开放程度，用中国相应年份的进出口总额与其国民生产总值 $cgdp$ 之比表示。

为减少数据异方差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对 exp_{ijt} 、 $cgdp_{it}$ 、 $wgdp_{it}$ 、 $dist_{ij}$ 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统计性描述

本文选取 2017 年对中国出口前 100 名的贸易伙伴，这些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额占据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 70.4%，其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 58%。然后实证检验了 2010—2017 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后者向中国出口的影响。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外交动态—外交日程”板块中记录了中国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他国，他国国家首脑、政府外长来华访问的详细信息，本文对此资料经过手工整理，形成了中国和贸易伙伴间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的数据；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贸易伙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伙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 (WDI)^②，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 1978 年的价格为基期进行平减，贸易伙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 WDI 提供的以 2010 年价格为基期调整的实际值来表示；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地理距离、语言相似性、边境等数据来自法国的 CEPII 数据库^③。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p_{ijt}	3.49E+10	3.49E+10	4.34E+7	1.95E+11	$cgdp_{it}$	8.08E+12	1.31E+12	6.10E+12	1.01E+13
dip_{ijt}	0.644	0.479	0	1	$dist_{ij}$	8.38E+3	4.33E+3	8.09E+2	3.84E+4
ccv_{ijt}	0.164	0.370	0	1	$comlange$	0.041	0.196	0	1
cov_{ijt}	0.161	0.368	0	1	$border_{ij}$	0.111	0.313	0	1
wcv_{ijt}	0.281	0.469	0	1	tfp_{it}	0.525	0.154	0.201	0.898
wov_{ijt}	0.281	0.450	0	1	$open_{it}$	0.482	0.058	0.388	0.545
$wgdp_{it}$	7.24E+11	1.96E+12	1.83E+8	1.73E+13	/	/	/	/	/

(三) 历年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次数和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总出口额

从图 1 可以看出，除了 2010 年，2011—2014 年间中国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总次数、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出访次数大致呈递增趋势，2014—2016 年出现小幅递减趋势，并在 2017 年出现上扬趋势。图 3 显示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在同期也呈现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址：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wsrc_674883/。

②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WDI)：<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

③CEPII 数据库：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asp。

相同的变化趋势。并且，图1中除了2012年以外，中国外长出访次数和图3中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总出口额也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再结合图2和图3也发现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和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总额基本呈现共同变化的趋势。综合图1—图3，可以发现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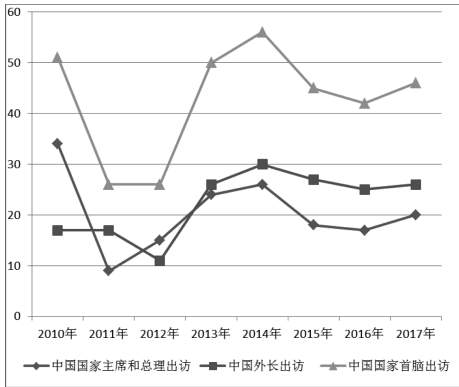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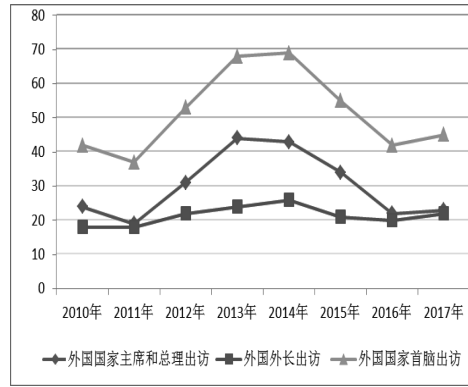


图2 外国国家首脑、政府外长来访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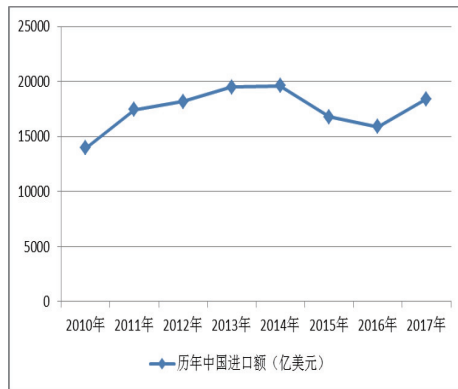


图3 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总出口额

资料来源：图1、图2数据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外交动态—外交日程”中的记录，图3数据来自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针对本文的平衡面板数据，考虑到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不能检验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缺点，而某些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又是一些研究者所关心的指标，本文首先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并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

1. 总样本检验结果

表2第(1)列报告了针对全样本的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本文仅仅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下文类同不再赘述。从表2第(1)列可以看到，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变量 *dip* 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0.252，说明了与国家首脑、政府

外长不出访相比,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能够促进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增加25.2%,即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有利于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表2第(2)-(4)列分析了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若干年后对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除了第2年以外,3年内发生的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事件仍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有着深远的影响,且滞后第3年的效应大于滞后第1年和第2年的效应。

表2 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与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额的基准回归

变量	总样本	t-1期	t-2期	t-3期	贸易伙伴 收入水平	访问类别			
						双边 访问	多边访问		
							G20 & APEC	APEC	G20
(1)	(2)	(3)	(4)	(5)	(6)	(7)	(8)	(9)	
$dip(t)$	0.252*** (0.05)	0.113** (0.06)	0.069 (0.06)	0.244*** (0.07)	0.116* (0.06)	0.343*** (0.05)	-0.055 (0.04)	-0.015 (0.05)	-0.07 (0.06)
$dip(t-1)$									
$dip(t-2)$									
$dip(t-3)$									
$dip \times Dcni$					0.462*** (0.12)				
$Dcni$					0.062 (0.19)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722	0.711	0.704	0.731	0.712	0.734	0.664	0.663	0.663
N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差;上述模型中已经控制了个体-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control、常数项的估计结果。后表类同,不再赘述。

2. 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较低的经济水平往往与较高的文化和制度障碍有关(Moons, 2013),与较低经济水平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可能会遇到更多的贸易障碍,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能够扫除或减少国际交易中的障碍,因此预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的出口对出访指标更加敏感。本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贸易伙伴分为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具体为:人均收入水平低于3 225美元的国家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高于3 225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定义二值虚拟变量*Dcni*,当贸易伙伴为中低收入国家时, $Dcni = 1$,当贸易伙伴不是中低收入国家时, $Dcni = 0$ 。表2第(5)列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 $dip \times Dcni$ 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为正值,说明相对于高收入贸易伙伴,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低收入贸易伙伴的出口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即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具有国家异质性。

3. 访问类别与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访问类别主要包括双边访问、多边访问。双边访问是两个国家一对一的专门访问活动。多边访问是指多个国家为参加同一国际组织或某个活动而在一个地点会面,共同商讨覆盖各国事宜的活动,本文将国家首脑、政府外长出访G20或APEC作为多边访问活动。

表2第(6)列是双边出访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dip 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为

0.343, 说明了双边访问有利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表2中第(7) - (9)列是针对多边访问的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各样本层面的多边访问 dip 的系数虽然为负值, 但是均不显著, 表明多边访问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无明显的促进效应。多边访问因谈判主题涉及多方利益而难以调和, 且谈判结果难以由各国严格执行, 所以经常不能高效且令人满意地解决参与方共同面临的国际贸易问题, 短期内对贸易难以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宋伟(2015)^[22]曾指出, 多边外交可以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 但由于涉及国家较多, 利益关系比较复杂, 对实质性推进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双边外交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4. 国家首脑、政府外交部长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Plouffe 和 Sterren (2016) 发现, 外交代表团的级别对优惠贸易协定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高级别的外交代表团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权限来解决优惠贸易协定拟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更加有利于优惠贸易协定的达成。高级别出访意味着出访国和接待国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组织出访和接待工作, 并且高级别出访官员具有更多的资源和官方授权的优势, 因此, 高等级的出访更能促进双边合作。本文将国家领导出访 dip_{jt} 细分为国家首脑和政府外长两种类型, 并针对两种类型的国家领导出访数据进行检验, 具体细分类别如下。

ccv_{jt} 是第 t 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对 j 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 赋予 ccv_{jt} 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cov_{jt} 是第 t 年中国外交部长对 j 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 cov_{jt}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wcv_{jt} 是第 t 年 j 国国家主席、总理、总统或首相对中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 wcv_{jt}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wov_{jt} 是第 t 年 j 国外交部长对中国出访的虚拟变量, 如果有出访记录, wov_{jt}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由表3第(1)、(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ccv 和 wcv 的系数都在 1% 的显著水平为正值; 而第(2)、(4)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cov 和 wov 的系数尽管都显著, 但都分别小于 ccv 和 wcv 的系数。表明国家首脑相比政府外长访问更有利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

表3 访问级别、访问程度、访问方向与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额的基准回归

变量	国家首脑、政府外长访问						访问程度		访问方向	
							单边访问	双边互访	单边出访	单边来访
	(1)	(2)	(3)	(4)	(5)	(6)	(7)	(8)	(9)	(10)
ccv	0.248*** (0.06)				0.235*** (0.06)					
cov		0.154*** (0.06)			0.133** (0.06)					
wcv			0.294*** (0.06)			0.311*** (0.06)				
wov				0.108** (0.05)		0.113** (0.05)				
dip							0.203*** (0.05)	0.233*** (0.07)	0.101* (0.06)	0.114** (0.05)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69	0.669	0.717	0.688	0.672	0.737	0.704	0.670	0.662	0.700
N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注: 同表2。

本文还探讨了同一年中同时发生国家首脑和政府外长访问时，两者对贸易是否会同时发生作用及两者的作用方向。由表3中第(5)列结果可以看出， ccv 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0.235， cov 的系数在5%的水平显著为0.133，说明当同一年中有国家首脑访问 ccv 时，中国政府外长访问 cov 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额的影响仍然显著。第(6)列使用贸易伙伴国家出访数据进行检验，仍然得出类似的结论。每次出访不是独立的事件，国家首脑和政府外长访问所谈判的主题是连续而又相关的，起到了相互铺垫或延伸的作用，以更好地保证访问目标的实现。

5. 访问程度、访问方向与国家首脑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国家首脑访问程度分为单边访问、双边互访。单边访问指在 t 年仅仅只有中国国家首脑曾经出访过贸易伙伴，而不存在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的情况；或者相反，仅仅只有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而无中国国家首脑出访贸易伙伴的情况。在单边访问中，根据访问方向不同又分为单边出访和单边来访。前者指中国国家首脑出访贸易伙伴，后者指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双边互访是在 t 年既有中国国家首脑出访贸易伙伴，又有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中国的情况。

表3第(7)列的检验结果显示，单边访问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0.203，说明单边访问有利于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第(8)列检验结果显示，双边互访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0.233，大于单边访问的系数(0.233 > 0.203)，说明双边访问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大于单边访问。由于双边互访比单边访问的访问程度更深，更容易就贸易、投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而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随两国访问程度的加深而增加。

表3第(9)列单边出访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0.101，第(10)列单边来访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0.114。尽管两者的系数差异并不太大，但是仍然可以发现国家首脑来华访问比中国首脑出访更能促进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0.114 > 0.101)，从而说明主动出访他国比被动地接待他国访问对本国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更大。通常，对于发生出访行为的国家，在协调两国国际贸易关系方面往往具有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建性，其国家首脑出访通常更有利于自身的出口。

(二) 稳健性检验

1. 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

贸易量和国家首脑出访由于反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内生性问题，还可以通过工具变量法来解决。Rose (2005)、Nitsch (2007)都曾使用两国间相互对旅客的吸引力作为“外交代表团”或“国家首脑出访”的工具变量。因为两国间相互对旅客的吸引力是外生变量，不会影响双边贸易量，两国间互相对旅客的吸引力会影响国家首脑对出访目的地的选择。本文选择样本期间，中国历年接待贸易伙伴旅游人次的对数值、贸易伙伴历年接待中国旅游人次的对数值作为“国家首脑出访”的两个可选择工具变量。相应旅游人次数据来自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的《旅游统计年鉴》(Yearbook of Tourism Statistics)。本文实证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检查工具变量IV和国家首脑出访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回归的F统计量均远远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对国家首脑出访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对于

某些分样本层面，本文同时使用两个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然后用 Hansen test 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相应样本层面的检验结果均大于 0.05，从而没有拒绝原假设，证实了相应样本层面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然后使用 Durbin-Wu Hausman 检验内生性的严重性，显示 p 均小于 0.05，说明了使用工具变量的必要性。表 4 和表 5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各列检验结果虽然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方面有所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前文的研究结论。

表 4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中国出口额-IV 工具变量法

变量	总样本	访问级别				访问程度	
	首脑出访	中国国家主席、总理	中国外长	外国国家主席、总理	外国外长	单边访问	双边互访
<i>dip</i>	0.778*** (0.15)					0.613*** (0.233)	0.927*** (0.17)
<i>ccv</i>		0.444*** (0.11)					
<i>cov</i>			0.384** (0.18)				
<i>wcv</i>				0.430*** (0.11)			
<i>wov</i>					0.260*** (0.07)		
<i>Hansen test</i>	/	0.10	0.13	0.13	0.12	/	0.12
<i>D-W-H test</i>	0.00	0.00	0.00	0.02	0.02	0.00	0.00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R²</i>	0.763	0.671	0.675	0.728	0.691	0.650	0.673
<i>N</i>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注：***、**分别表示 1%、5% 的水平显著。

表 5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中国出口额-IV 工具变量法

变量	访问方向		访问类别		贸易伙伴收入水平
	单边出访	单边来访	双边访问	多边访问 G20&APEC	
<i>dip</i>	-0.087 (0.11)	0.155** (0.08)	0.694*** (0.13)	-4.18 (3.67)	0.230*** (0.031)
<i>dip×Dcni</i>					0.101** (0.05)
<i>Dcni</i>					0.033*** (0.01)
<i>Hansen test</i>	0.17	0.17	0.20	/	0.22
<i>D-W-H test</i>	0.04	0.03	0.03	0.04	0.03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是
<i>R²</i>	0.600	0.700	0.765	0.64	0.710
<i>N</i>	800	800	800	800	800

注：***、**分别表示 1%、5% 的水平显著。

2. 动态系统 GMM 检验

本模型还可能存在其他内生变量，考虑到国家首脑出访对贸易的影响存在延续性，动态系统 GMM 检验方法又具有能较好解决多个内生解释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从变量内部方便寻找工具变量的双重优点，本文用动态系统 GMM 进行稳健

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可以发现检验结论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表6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出口额—系统 GMM

变量	总样本	访问级别				访问程度	
	首脑出访	中国国家主席、总理	中国外长	外国国家主席、总理	外国外长	单边访问	双边互访
<i>L. lnexp</i>	0.317*** (0.05)	0.274*** (0.03)	0.547*** (0.03)	0.328*** (0.03)	0.384*** (0.01)	0.197*** (0.02)	0.294*** (0.03)
<i>dip</i>	0.232*** (0.07)				0.205***	0.724*** (0.04)	(0.04)
<i>ccv</i>		0.583*** (0.07)					
<i>cov</i>			0.232*** (0.05)				
<i>wcv</i>				0.767*** (0.11)			
<i>wov</i>					0.116*** (0.02)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P (AR1)</i>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i>P (AR2)</i>	0.17	0.29	0.32	0.17	0.07	0.15	0.28
<i>Sargan/Hansen test</i>	0.22	0.11	0.53	0.08	0.32	0.09	0.08
<i>N</i>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注: ***表示在1%的水平显著。

表7 国家首脑出访与伙伴国家对出口额—系统 GMM

变量	访问方向		访问类别		贸易伙伴收入水平
			双边访问	多边访问	
	单边出访	单边来访		G20&APEC	
<i>L. lnexp</i>	0.313*** (0.01)	0.348*** (0.01)	0.265*** (0.03)	0.481*** (0.05)	0.323*** (0.01)
<i>dip</i>	0.169*** (0.03)	0.192*** (0.02)	0.357*** (0.05)	0.116 (0.08)	0.328*** (0.02)
<i>dip×Deni</i>					0.067*** (0.02)
<i>Deni</i>					0.277*** (0.03)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trol</i>	是	是	是	是	是
<i>P (AR1)</i>	0.00	0.00	0.00	0.00	0.00
<i>P (AR2)</i>	0.11	0.06	0.21	0.15	0.18
<i>Sargan/Hansen test</i>	0.12	0.11	0.33	0.45	0.58
<i>N</i>	800	800	800	800	800

注: ***表示1%的水平显著。

3. 控制期初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缓解内生性

借鉴宋凌云和王贤斌(2013)^[23]对内生性的处理方法,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期初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作为额外控制变量。如果国家首脑出访是根据其历史贸易额而选择出访次数, 即双方首脑可能会因为历史贸易额较少而增加出访, 以便开拓国际市

场或进口更多的重要物资,如果这些反向因果关系非常严重的话,则控制样本期的出口额后,可能无法观察到国家首脑出访会提高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额的事实。相反,如果实证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则说明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不太严重,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控制了期初(2010年)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后,发现各个出访指标的系数虽然都有所减少,但是各系数符号的方向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说明控制期初的贸易额缓和了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没有发生变化^①。

4. 控制经济周期的影响

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额还可能与经济周期有关,本文借鉴 Eslava (2013)^[24]的做法,用相应年份世界经济 GDP 的增长率作为时间固定效应,但是结论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②。

5. 安慰剂检验

样本中,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家首脑出访的次数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为安慰剂检验提供了可能。本文根据出访次数,分为高出访贸易对和低出访贸易对,具体的划分依据是:如果在第 t 年,中国和国家 j 的任何类型的首脑出访指标的系数值 x_{jt} 满足: $x_{jt} > \sum_{j=1}^n x_{jt}/n$,其中, n 代表国家数量,即个体出访指标值大于其同类平均值时,则该贸易对是高出访贸易对;反之,该贸易对是低出访贸易对。如果这些低出访贸易对的出访指标都不显著,就说明较少的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没有扩张作用,间接验证了高频率的出访才会对贸易有扩张作用。

检验结果表明,在高出访贸易对中,出访的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且在那些出访指标显著的检验结果中,出访系数比基本回归中的系数略大,进一步强调了国家首脑出访对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扩张作用;但低出访贸易对中,出访的系数都不显著,验证了只有出访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对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有扩张作用,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③。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以国家首脑出访为代表的外交活动对贸易的影响,在细分访问等级、访问程度、访问方向、访问类型、国家收入水平维度上对外交活动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国家首脑出访可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其中,首脑出访、双边互访、单边主动出访、双边访问、中低收入贸易伙伴的访问活动依次比政府外长出访、单边访问、单边来访、多边访问、高收入贸易伙伴的访问对外贸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得到的启示如下:第一,外交访问能直接化解两国的经济政策分歧、扩大共识、增进互信,进而扫除国际贸易障碍而直接促进对外贸易投资活动。外交也能通过对他国消费者建立起的信任机制创造贸易需求,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

①限于篇幅并未列出实证检验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限于篇幅并未列出实证检验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限于篇幅并未列出实证检验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都会对国内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影响,那种置对方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单边主义行为不但破坏了世界贸易秩序,而且会伤害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感情、从而恶化本国的贸易环境并危及自身国家的经贸利益。第二,提示国家间应当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家首脑在外交谈判中的威信、政治权利和社会影响力而进行主动、互动的外交谈判。第三,多边主义外交往往意味着低效率以及合作流于形式,对于实质性推进国家间政治和经贸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双边外交在协调双边关系方面更有效率和可操作性。鉴于此,中国的外交应该增强双边外交的战略导向,不能过分夸大多边区域一体化外交战略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如今的多边外交活动还难以发挥贸易创造效应,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对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分歧在秉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协调,并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以探索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第四,外交对贸易的影响力还取决于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伙伴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文化和制度壁垒,因此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贸易、投资活动会遇到更多的贸易障碍。鉴于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间的外交的贸易创造效应较强的事实,建议中国政府的经济外交应多关注具有巨大市场准入壁垒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外交沟通降低中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时面临的文化和制度壁垒。

[参考文献]

- [1] MOONS S, BERGEIJK P. A Meta-analysis of Economic Diplomacy and Its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lows [R]. Working Paper, 2013(566): 1-34.
- [2] 蔡洁,陈军亚. 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J]. 经济评论, 2011(3): 117-124.
- [3] 金灿荣,戴维来.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3): 50-70.
- [4] 迟永. 中国对外贸易提高了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吗[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2): 131-154.
- [5] POLLINS B M. 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9, 8(2): 465-480.
- [6] MORRISET J. Does a Country Need a Promotion Agency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mall Analytical Model Applied to 58 Countries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2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2003: 1-45.
- [7] VOLPE M C, CARBALLO J. Export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Kind of Trade do They Promote? [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1, 21(4): 1-40.
- [8] NITSCH V. State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World Economy, 2007, 30(1): 1797-1816.
- [9] ROSE A. The Foreign Service and Foreign Trade: Embassies as Export Promotion [J]. World Economy, 2007, 30(1): 22-38.
- [10] VAN B, YAKOP M. The Economic Effectiveness of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ts Contribution to Bilateral Trade [J].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2011, 6(1): 101-120.
- [11] GIL S, LIORCA R, SERRANO J.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xport Promotion: The Spanish Case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8, 87(1): 139-146.
- [12] AIDT T S, MARTIN G. Do Autocratic States Trade Less?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0, 24(1): 38-76.
- [13] HART M. Canadian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R]. A Canadian Priorities Agenda: Policies to Improve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IRPP.

- [14] HEAD K, RIES J. Do Trade Missions Increase Trad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43(2): 754-775.
- [15] DEARDORFF A V.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Does Gravity Work in a Neoclassical World? [R]. NBER Working Paper, 1998(5377): 1-27.
- [16] GRINBLATT M, KELOHARJU M. How Distanc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fluence Stockholdings and Trad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1, 56(3): 1053-1073.
- [17] PLOUFFE M, STERREN R. Trading Representation: Diplomacy's Influence o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6, 18(4): 889-911.
- [18] GRAY J, POTTER P. Diplomacy and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R]. <https://ssrn.com/abstract=3012639>, 2017.
- [19] KOSTECKI M, NARAY O. Commercial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 Clingendael Discussion Paper in Diplomacy, the Hague, Clingendael Institute, 2007.
- [20] NARAY O. Commercial Diploma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2010(6): 121-148.
- [21] MEI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211-242.
- [22] 宋伟. 中国的周边外交: 多边主义还是双边主义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5(4): 6-13.
- [23] 宋凌云, 王贤斌. 政府补贴与产业结构变动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4): 94-106.
- [24] ESLAVA M, HALTIWANGER J, KUGLER A, KUGLER M. Trade and Market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Colombia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16): 135-158.

(责任编辑 蒋荣兵)

Does the Diplomatic Visiting Affect a Country's Export Trade

ZHAO Yongliang TANG Dandan WEI Yaoy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te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this paper analysed data from China's visiting history with 100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from 2010 to 2017, and empirically assessed the impact of this on the export of trading partners to China. The results of the paper show that the head of state's visit has a spillover effect on exports. Moreover, four comparisons can be made: high-level heads of state visits have more spillover effect on exports than lower level heads of state visits; bilateral exchange visits have more effect than unilateral access visits; unilateral active visits also have more effect than unilateral reception visit; and finally, bilateral visits have more effect than multilateral visits. Additionally,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head of state on trade has a national heterogeneity. The above results have passed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plomacy and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ortance of countries in creating a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through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Heads of State Visit; Diplomacy; Export; Trading Partners